

□ 怀念师友

今非昔比，但是登岛采访难以再次实现。

再去时，不知道又有多少学长渺茫。所以走的时候，彼此就怀了一种今世不再的心情。

去年，我给他寄出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将他与在台的九位西南联大学长谈话内容收录其中。希望他们看到后能够感到宽慰。

那支歌曲《秋水伊人》，好像又飘浮在海峡上空，让我怀念那边一往情深的老学长们。

期盼与离散，成为了那一代赴台学人的生命基调。然而他们的心并没有漂移，它永远坚定地向着母土，向着故乡。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游子。

2014年7月11日

怀念李明，我的革命领路人

○周锦荪（1945物理）

李明，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13年12月15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7岁。

我同李明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从1942年秋到1945年秋，不过三个年头，但这正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从沉寂到复苏的三年，是我的思想彻底转变的三年，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三年。在其中，李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1940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而考

入西南联大的。而这一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投入救亡运动的天津南开中学（我们称之为老南开）的同学开始来联大复学，其中有因被捕而脱党的老党员张信达和曾到延安学习回来的涂光炽、许寿谔。我出于年轻而好奇，主动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一道参加读书会 and 以后的秘密读书小组，开始接触党的理论和党史学习，讨论抗战形势。两年后，我决心从工学院转学到物理系，来到位于昆明大西门外的联大新校舍，住进老南开比较集中的26栋宿舍。而李明也刚好由河南抗日前线回到联大复学，我们就住到了一起。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身材比较高的美男子，两眼炯炯有神，谈笑风生。我们又刚好同修历史系教授孙毓棠的“中国通史”，每周两次四节课，都在上午。听完课回宿舍后，昆明秋冬的阳光正好，我们便在宿舍门口坐着谈天，除了议论孙先生的讲课外，就是听他讲在河南前线的见闻，令我深感兴趣。这就是我们友



1943年秋摄于昆明西山。左起：李明、李廉、李晓、李璞

谊的开始。

老南开的同学集体郊游常常带上我，我们一起爬西山，下龙门，游滇池到大观楼，在船上还轮流喝一口廉价的水酒。带着酒意，大家唱起了歌，唱《延水谣》或者《二月里来》，这就是当年大学生的风流。而有一次，在1943年的暑假，李明和生物系的殷汝棠要到安宁县的山区去探望一位从延安归来的音乐家李雪汀，居然也把我带上，搭便车到安宁县境，再走小路到山区，在李家住了两晚，受到雪汀和他母亲的热情接待。我第一次吃到云南的野生菌和麂子肉。因为下雨，山区阴冷，我们还烤着木炭火盆吃芋头，打麻将。现在想来，这是他们三位的战友重逢，党员接头，而我只是知道好玩好吃而已。

从1943年秋季起，李明就明显地开始忙碌起来，对我们小组学习抓得比较紧。读《联共党史》和《整风文献》，还有《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小组的成员常有变换，扩大了我的交往范围，认识了不少新同志，但从来没有同李明在一个小组。只有每学期一次的生活会以中型规模召开，我们才一起参加。这种会当时以互相鼓励为主，但是李明曾给我一个十六字的“赠言”，一共四句。前两句记不得了，后两句却终生难忘。它们是“咬牙向下，由下而上”。我知道这是教育我要抛弃知识分子“象牙之塔”式的幻想，要面向群众，面向劳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咬牙”，起过很好的作用。他还曾要我参加一个女同学的小组会，听她们相互自我介绍，但我只是认真听了，没有发言，起不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周锦荪（后）与李雪汀

这一时期的我，仿佛是同时读着两个学校。一个是联大的正规学习，我成绩一直很好，家里也对我很放心，按时给我寄生活费。一个是我们的小组学习，是我的政治生活，虽然常常是囫圇吞枣，一知半解，但我从不放弃。我一直选择理科学习，是觉得科技人员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我对自然科学的逻辑性、数学性又深感兴趣。我觉得自己只会读书，不是革命的“料”，只想在从事业务工作的同时关心革命，关心党的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一名“同路人”。但是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越来越深入，我终于走上了现在的路。

1944年的“五四”，是联大校园中兴起爱国民主热潮的新起点。学生社团和壁报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到下学期开始，李明告诉我，打算办一个理论性较强的政治、时事壁报，定名《学习》，由他亲自主编，约一个较强的写作班子，但要我同历史系的张光琛出去向训导处登记，并要我协助他做誊写、排版的工作，我当然欣然接受。第一期稿件集中后，他教我抄写，说壁报的编排要给人整洁明净的感觉，全用白纸和固定统一的格子来抄，抄

□ 怀念师友

写的每个字都要力求近似圆形，向一个中心点集中，每张纸都按固定的大小折边后再贴上壁报板，这样远远望去也感到整齐美观。他亲自用毛笔题写刊名，“学习”两个字写得有力而又飘逸。我的字本来写得不好，根据他的要求努力去做，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这个壁报，一开始有高人写稿，颇有气势，受人重视。但是三期以后，李明太忙，无暇顾及，我同光琛又拉不来多少稿子，有时靠翻译一点从美军朋友传来的美国剪报凑数。《学习》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们是力不从心，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李明当时忙碌的程度吧。

到了寒假前夕，李明又通知我，准备利用假期到滇南的滇军去劳军。这使我很为难，我本想利用在学校最后一个假期读一点原子物理方面的参考书，但李明很坚持，他说这次活动要起培训干部的作用，要我务必参加。果然，集体生活的劳军活动对我的锻炼很大。而李明自己更是成为全团的第一大忙人，为了要给部队讲大课，又要参加劳军演出，他真是“喊破了嗓子”，仍然坚持把课讲完，令大家都为之心疼不已，给我们树立了“干革命不辞劳苦”的形象。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值得我终生回忆的。从劳军队回来的十几个同学几乎全部都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而这时，一个全新的学生组织在校园里出现：由从新四军回来的洪季凯等人，经党的地下省工委同意，成立了秘密的、由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这个组织很快在进步同学中发展，我们劳军队员也几乎人人都被波及。直到5月，李明等党员才决定另行成立联

大的民青第二支部，发展我们参加。这成为我参加革命的起点。而几乎与此同时，李明又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在重庆下游的三斗坪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可以转送有志青年前往湖北宣化店的中原解放区。他说，考虑先送两个人去，一个是罗长有，他是四川人，又有社会经验，办事干练；另一个就是我，学理工的，对新解放区更有用。叫我先作心理准备。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颗心理重磅炸弹，我将要直接参加革命了！为了革命，我将舍弃学业，舍弃家庭，舍弃一切！所有的私心杂念统统消失，我决心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到解放区去开始新的生活，做全新的人，做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

当然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喜悦和冲动，很快新的消息传来，三斗坪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人发现并遭到破坏，去中原解放区的秘密通道断了。但是，经过这十几天心灵的冲撞我的心总也平静不下来。我努力安心参加了毕业考试，总算除体育外全部合格，算是对五年大学生活做了小结。便同张彦一起到昆明美国新闻处参加湘西前线的战地调查，直到日本投降，于9月初回到昆明。仍是由李明安排我参加一个民青小组去墨江中学教书，在那里入党，并一直留在云南工作。

此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李明共处，我们只有这三年的缘分。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十分关键的三年，三年中是李明把我引上了从革命到入党的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停留在我心中深处。

安息吧，明兄！安息吧，李明同志！